

晚清醇儒



朱次琦

蒋志华·著

晚清醇儒



朱次琦

蒋志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醇儒：朱次琦 / 蒋志华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7

(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ISBN 978-7-218-05553-4

I . 晚… II . 蒋… III . 朱次琦—传记 IV .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2994 号

特约审稿	李锦全 黄明同
责任编辑	黎 捷
封面设计	文 晖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5
插 页	2
字 数	119 千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18-05553-4
定 价	1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157】



朱次琦返乡讲学图



朱次琦中进士授任知县图



朱次琦受賜五品京卿銜圖



朱次琦奉命出使塞外图

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总序

林 雄 欧 初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

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饱尝难以想象的艰辛，战胜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远大的目光，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广东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岭南并非“南蛮”，她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岭南人树起的丰碑，如惠能开创的中国禅宗、陈献章开启的明代心学、康有为和梁启超引领的近代维新思潮、孙中山开拓的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道路，等等。岭南文化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色，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奋发进取的岭南人。

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选取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作为研究介绍的对象，共同组织策划编写《广东历

史文化名人丛书》。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名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或学科，曾经取得卓越的业绩，或其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杰出人物。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文化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物质生产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研究宣传这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为先进文化展示一种典范，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先辈如何开拓历史，如何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初步选定数十位历史人物作为“丛书”的传主，分期分批组织撰写和出版。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坚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如上原则是“丛书”的共性，而“丛书”中的每本著作所特有的立

意、结构、行文，则体现了作者们的独创性劳动，这是每本书的个性。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广东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广东的文化品位，培养广东人的文化素质，为建设文化大省尽绵薄之力。

（林雄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欧初系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前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广州大学客座教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天才敏隽 科场盘桓 3

- 一、盛世不再 4
- 二、家乡与家世 7
- 三、潜心读书 13
- 四、科场躊躇 20

第二章 廉吏政绩 三晋留芳 37

- 一、候职晋中 38
- 二、初试锋芒 43
- 三、为政襄陵 47
- 四、急流勇退 57

第三章 礼山设教 桃李天下 64

- 一、归隐九江 65
- 二、讲学礼山 69
- 三、弟子康有为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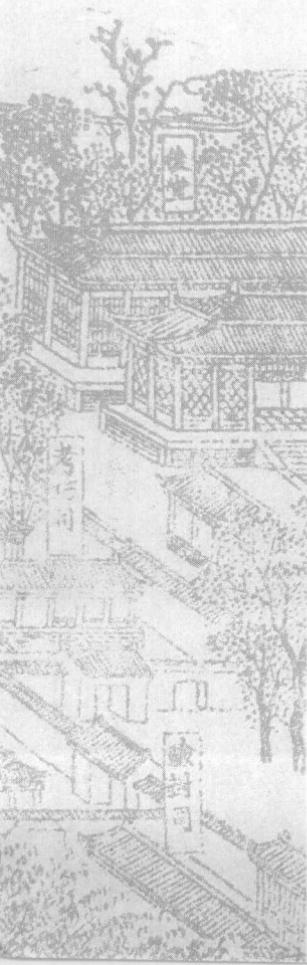
第四章 谱学匠心 诗书神韵 102

- 一、睦族与修谱 103
- 二、诗文与诗论 111
- 三、书法与书论 120

第五章 不言而化 岭表大贤 128



一、风义乡里	129
二、焚稿与薪传	139
三、追思与纪念	148
余论	156
大事年表	158
主要参考书目	163
后记	166





引言

熊十力曾评价朱次琦：“涵养深厚，德性纯懿，潜不遗世，清不绝物，真醇儒也。”（见《十力语要·与燕大明》）

朱次琦（1807—1882），人称九江先生，广东南海人，清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也是著名的清官，被公认是那个时代为人、为师、为官的典范。朱次琦在山西任职时间不长，而政绩卓著，后被清国史馆收入《循吏传》。他回到家乡后讲学授徒二十余年，培养出康有为、简朝亮等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岭南一代宗师，后被《清史稿》收入《儒林传》。

朱次琦生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最初阶段，时代与环境的局限使他没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他一生身体力行一个传统儒者的理念。朱次琦比较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国学的种种偏颇，力图从儒学的源头——孔子之学那里汲取活力、寻求解决时弊的办法。朱次琦为学，注重学问的本末源流，讲求知识的融会贯通。他反对当时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力主以孔子之学为依归。他强调修德致用，号召读书人注意修养个人身心，担当天下国家之重任。他最终将他的学生托上了新旧思潮交汇的风口浪尖。朱次琦临终将自己一生的文稿焚毁殆尽，成为梁启超眼里中国旧学的一个句号，身后的九江学风则对岭南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次琦出仕则为循吏，退隐即是良师，堪称是躬行践履



的一大醇儒。本书充分挖掘和考释见存的第一手资料，力图以通俗的文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朱次琦。

第一章



天 才 敏 隅
科 场 盘 桓



一、盛世不再

朱次琦，字效虔（一作“浩虔”），又字子襄，号稚圭，嘉庆十二年（1807）农历八月二十二，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九江乡西方太平约的一个小康家庭里。这时的中国社会刚进入19世纪不久，乾隆盛世已经过去，酝酿和累积已久的种种社会问题逐渐凸显。

中国的社会经济长期是农业型和内敛型模式，历来重农抑商，讲求“知足常乐”。政府通常只注重“节流”，而不鼓励“开源”，尤其不鼓励国内外贸易。技术革新一向被忽视，农民大都不识字，而文人们很少会把精力放在农商生产的实际问题上。到清朝中叶，中国农业技术已显得陈旧落后，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也很匮乏，而人口却在剧增。乾隆五十八年

（1793）全国人口已有3亿以上，乾隆末年英国来华使团的一位成员曾回忆说：“在这个国家，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到道光十四年（1834）已达到4亿，中国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而生产却越来越难以满足消费，农民日趋贫困。一些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自发移民，还有一些人被迫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近乎游民，这很容易造成“山中之民，一啸百吟”的状况。嘉庆以后，几乎



「嘉庆皇帝」

无日无内乱，如白莲教起义、回民起义、苗瑶暴动以及东南沿海的海盗，持续不断。

而鸦片的流毒更使清朝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鸦片在中国很长时间原本是和汤煎服的药品，据说是爪哇的荷兰人最早发明了抽鸦片的方法，使鸦片从药品变成毒品。17世纪中叶，鸦片随着荷兰人传到台湾，之后逐渐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再进入内地，并迅速在中国社会蔓延。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英国通过其东印度公司大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这使英国不仅扭转了对华茶叶贸易的逆差和白银出超的状况，还为维持其印度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中国的鸦片商亦以此牟取暴利，沿海的鸦片走私极其猖獗。清朝早在雍正年间就已下令禁烟，嘉庆时更是再三厉行禁烟，但却屡禁不止。进入19世纪，中国人成了全球鸦片的最大消费群体。从1800年至1820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4500箱，其后逐年见长，从1838年起增至每年4万箱。巨量的毒物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祸患：白银大量外流，到后来，中国一年由于鸦片而流失的银两几乎占国库全年收入的1/6，造成银钱飞涨，财政困难。更可怕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嗜毒成瘾，从官员士绅到平民百姓，从优伶仆役到僧尼道士，各个阶层都在吸食鸦片，在广东连乞丐都在吸食鸦片，成为国计民生之大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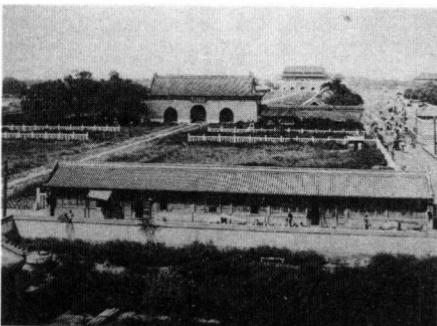
到清朝中期，各级政府已秩序森严，其体制和运作基本上都是墨守成规、陈陈相因。清政府的中枢机构由内阁变为后来的军机处，皇帝更加专权。为加强皇权，同一类事务往往有不止一个部门来管理，造成机构重叠，衙门之间相互牵制。上层因权力过于集中而常常疲于奔命，而下层则因权力过小而无能为力。官僚队伍庞大臃肿、僵化不灵。官员已养



成循规蹈矩的心态，不敢也很难实行什么改革。官员们尽一切可能避免事端，息事宁人，得过且过，以求平稳升迁。官场里一派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气氛。

官宦人家习惯的排场、大家族制度下众多的寄食者，使得官僚们尤其是中下层官员常常感到入不敷出。清朝官员俸禄种类繁多，比如在京的文官有俸银、俸米、恩俸，地方上的文官则领俸银和养廉银，养廉银由各省自行发放，无固定标准。各处官员俸禄数额永远难以平衡，难免相互攀比，于是巧取豪夺，想尽办法为自己捞油水。国家财政没有形成预算和审核制度，税收没有确定的数字，收取多少税往往取决于纳税人、收税官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面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差官税吏沆瀣一气、损公肥私，他们收受贿赂，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通过挖空心思、巧立名目盘剥来的民脂民膏大都由地方官府、地方豪族和上级政府三者之间分肥。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往往狼狈为奸，因为与官府关系良好，富有家族和地方上获得功名的人赋税负担比一般农民要轻，这使得农民负担更加沉重，饱受地主和官府的盘剥。这种“劫贫济富”式的税收政策使不少农民为了减轻赋税，纷纷投靠豪门富户，接受富户的剥削，这又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官场的严重腐败使国帑民财消耗殆尽。

中国长期是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因而中国人一向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物质和精神上都处在封闭自足的状态中。清代在康熙朝之后，对外越来越持保守防范的态度，不欢迎渡海而来的西方人。乾隆时禁断了广东以外的一切中西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谋求商务利益，一经当时广东巡抚的奏闻，英吉利国王就成了“边塞夷王酋长”一类，显然中国政府是把华夷之间的不平等当



清末北京紫禁城

作中外交往的前提。天朝尊严在当时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乾隆皇帝下敕谕说：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一向不用外夷的货物以通有无。这一方面出于自大，另一方面则出于对西方人的造访怀有疑忌。

清政府认为外国人对中国“常怀吞食之志，往往外假经商之名，遂其私计”。于是想通过限制中西交往守住华夷之界。

清政府在一口通商的广州严格限制和管束外商的活动，比如，规定不许外国人随便出游，只许他们每个月 8、18、28 日这 3 天 10 人以下结伴游览指定场所，不许外国人用轿，不许外国人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不许外国人在广州过冬，不许外国妇女进入商馆等等。鸦片战争前，中国人能接触到的外国人只有来广州做生意的极少数西方商人，他们往往被中国人描绘为像幽灵一样往来飘忽不定的人。中国志书里的记载总是搞不清西方国家的名称。从官府到一般读书人很少有机会有兴趣了解外国的事情。直到 19 世纪前期，中国人眼里的欧美国家仍是中国几千年认知中的边远夷蛮小国。当西方人已经开始横行中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还几乎是一无所知。

二、家乡与家世

朱次琦的家乡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这里土地肥